

绵阳市志丛书之二十八

绵 阳 市 商 业 志

绵阳市商业局编

一九九四年·绵阳

绵阳市商业志

绵阳市商业局编

850×1168mm 32开 印张16.5 千字420
插页8 1995年9月印刷 印数1000册
内部资料性图书准印证:绵市新字第2345号
排版:绵阳市魏城彩印厂激光照排部
印刷:绵阳市魏城彩印厂

内部发行

《绵阳市商业志》

编纂领导小组及主编名单

组 长:张在琨
副 组 长:李保国 张 增
成 员:何明文 傅明阶 宁乾忠
白炳斗 简 明 王泽溥
李世龙 阳运芳
顾 问:张 浪 侯国文 邢树功
杨才玉 傅永康
主 编:张在琨
副 主 编:李保国
执 行 主 编:李世龙
执 行 副 主 编:李绍广
志 稿 审 改:王志强
校 对:李绍广 吕昌蓉



1990年秋,市委书记周裕德(左)、市长王金城(右)在市商业局局长张在琨(中)陪同下视察新建的百货大楼



马敬洪副市长在全市商业工作会议上讲话

序

《绵阳市商业志》志稿甫定，乃全市商业职工政治、文化生活之大事，幸甚！

掩卷沉思，抚今追昔，斗转星移，沧桑世变，随文明演进，流通兴起，千百载通生产与消费之桥梁，连城乡物资交流之纽带，宏关社稷安危，微系黎庶生计。其地位磐固者，何也？乃经济法则所定，国计民生不可缺也，非人力可为。然商业兴衰，囿于诸因。大凡社会宁靖，生产兴盛，政令利商，交通便捷，则商业兴，反之则衰，古今莫外。

近百年来，市境商业历经巨变。民国及其以前，风风雨雨，举步维艰。新中国建立至“一五”结束，社会主义商业根基已奠；其后二十一个春秋，曲折与发展并存，经验与教训同在；改革开放，政通人和，契机启动，万象更新，百业兴旺，经济腾飞，物产丰富，市场繁荣。破渠道单一之陈规，兴百舸争流于商海。蜀道通衢，货畅东西南北；商厦林立，便利万户千家；商品琳琅，群众生活改善。民颂中共之决策，共奔小康之殷富。

“乱世筑城，盛世修志”。为承修志之传统，绵阳市商业局编成市境商业专志，既颂今之盛况，又溯史之嬗变。虽非精雕细刻之上品，然可见本世纪市境商业兴衰之端倪。且通篇言之有据，存真求实，当属信史。可谓无愧于先辈，有益于今人，遗惠于后世，于存史、资治、教化之功大焉。

修志资料浩繁，或存于档、载于文、诵于口，皆需辛勤笔耕，

非有志于斯者难充其任。兼政区、机构频变，年代久远，部份资料散失，困难诸多，不言而喻。值此《绵阳市商业志》即将付梓之际，谨向乐此不疲，奋笔疾书诸君聊表由衷之谢！

张在琨

一九九四年九月

凡 例

一、指导思想和编纂原则：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存真求实的原则，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二、主要内容和记述范围：本志是以绵阳市境商情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资料书，主要反映绵阳市商业局系统国营商业、饮食服务业、商办工业、集体商业的历史和现状，述而不作，寓观点于记述之中。记述范围以绵阳市政区为主，1950年至1985年兼述绵阳专（地）区商业史实，1985年至1990年均为绵阳市辖范围。记述中，以绵阳市商业局，各直属单位事业发展和局机关各项管理为主要对象。

三、结构和体例：本志分卷首、主体、卷尾三部份。卷首由图照、序言、概述、大事记等组成；主体部分由各章、节组成，以章、节、目、子目为结构形式；卷尾由附录和后记组成。本志遵循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的修志体例。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以记、志、图、表、录为主要体裁，以志为主，表、录分别附于章、节之后。

四、详略原则：本志遵循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特略同、详市境略专（地）区、详事业略背景、详经济略政治的原则，突出专志贵专的特点。

五、时限及纪年：本志上限为清末，个别史实适当上溯；下

限为 1990 年。建国后采用公元纪年，建国前在用旧纪年的同时，用括号加注公元纪年。

六、计量单位及币制：建国前的计量单位，一般按资料照实记录，未作换算；建国后一般用公制，但个别情况下折算困难时（如农副产品奖售布票等），仍用旧制。币制按各时期市面流通货币单位书写。民国时期币制混乱，一般在金额后用括号加注币种。建国后 1950 年至 1955 年的旧人民币金额，一律换算为新人民币。

七、统计数据及写法：统计数据一般根据统计年鉴、历年各类报表、工作总结以及其它资料，购销指标偏重使用统计部门资料，利税指标偏重使用财会部门资料，无正规报表的忠实于资料原文。对正文与附表矛盾的数据进行了核实，从其一说。正文与附表数据、百分比及纪年一律按 1987 年国家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用阿拉伯字书写。

八、称谓和引文：本志一律使用第三人称。文中以事系人时直书其名，不加褒贬。地名忠实于资料称谓。专业术语从习惯称谓。历史朝代、政权、党派、团体直书其名。政治、经济活动的称谓从其习惯，如“大跃进”、“三清”、“文化大革命”、“经济调整”、“体制改革”等。文中简称，均从惯例，“中华民国”简称“民国”，“抗日战争”简称“抗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简称“建国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简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元 1990 年”简称“1990 年”。引用重要文告忠实于原文、原意，凡引原文均加引号。

九、人物记述：行政职务列到绵阳专署工商科正副科长，绵阳专（地）区、市商业局正副局长、顾问、调研员、革命领导小组正副组长及成员，各直属单位正副经理、厂长、主任、队长、站长、校长、院长（所长）、革命委员会（领导小组）正副主任、组

长；党内职务列到正副书记、党组成员、核心领导小组正、副组长；工会职务列到主任、主席。其余人物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记述。

十、资料来源：本志卷首概述和主体各章节由绵阳市商业局商志办、各直属单位、局机关各有关科室主要根据绵阳专（地）区、市商业局历年档案资料和绵阳专商局成立前的绵阳专署财委、工商科档案资料写成，组织机构（含历届党政工领导任职表）和大事记依据各直属单位及局机关科室预审定稿写成，数据均有文字依据，史实中的口碑资料所占比重极小。

概 述

绵阳历史悠久，自汉置涪县，已有 2100 多年。绵阳市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北依剑门天险，南俯沃野平川，素有“控扼川西，推为首要”，“剑门锁钥”、“蜀道咽喉”，“川西北重镇”之称。市境幅员 20249 平方公里，1990 年底总人口 491.81 万。境内气候温和，四季分明，物产丰富，水稻、小麦、油菜、玉米、红苕、大豆、花生、海椒、甘蔗、蔬菜、生猪等是其主要农副产品。绵阳工业发达，已基本形成电子工业为龙头，食品、机械、建材、纺织、丝绸、冶金工业为支柱的工业体系。且交通方便，涪江贯通南北，宝成铁路、川陕、绵渝、唐巴公路穿越其间，水陆交通，四通八达，货畅其流有赖于斯。另有西蜀子云亭、蒋琬墓、李白纪念馆、杜甫草堂、文同墓冢、窦团奇峰、白水秀湖、七曲山大庙、“深山故宫”报恩寺等国家和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风景名胜 210 多处，奇山秀水遍布全市，是发展旅游、饮食服务业、繁荣商业的理想环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使绵阳千百年来逐渐成为川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和“舟车辐辏、商贾云集”、“倍形殷富”的物资集散地与商贸中心，在四川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

清末，清王朝重农抑商略改。光绪 30 年（1904 年），绵阳市境就有生丝、兰靛、药材、茶叶等商品输出，其中生丝 3300 担，值银 200 万两，兰靛 280 万市斤，值银 16 万余两，附子 100 万市

斤，茶叶 2000 包。输入以洋纱为主，仅绵州岁约 300 余万市斤。光绪 33 年（1907 年），捐税丛生，至宣统元年（1909 年），绵阳市境输出输入大减，输出输入总值银仅 238 万两。随着商品的输出输入，绵阳市境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

（二）

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前，由于市场物价总水平相对稳定，绵阳市境兰靛、生丝、药材、米粮市场先后形成。民初，市场繁荣，从商者盛。兰靛产销居四川之冠，梓潼、江油两县年产 30 余万担，占全省 50 至 60%。绵阳、三台、梓潼、盐亭 4 县是川西北生丝主产区，年输出 7000 担左右。民国 13 年（1924 年）前后，中坝、彰明、绵阳药材市场兴旺，尤以中坝极盛，码头船舶逾百艘，骡马川流不息，年交易药材 200 余种，当归达 100 万市斤，彰明产销附子 632 万市斤，绵阳麦冬远销重庆、上海 120 万市斤。民国 19 年（1930 年）至民国 23 年（1934 年），生丝产销兴旺，绵阳市境年产 9520 担，出口 6120 担。绵阳麦冬渐次转衰，年销仅 20 至 30 万市斤。三台年销土布 20 余万疋，潼川豆豉约 250 万市斤。民国 25 年（1936 年），丝价下跌，绵阳市境输出仅 4820 担。产销食盐 38 万担。绵阳麦冬产销回升到 60 余万市斤。绵阳、三台米粮市场始旺，绵阳有东南邻县及本埠米贩、囤户、牙行斗纪 220 余户，年输入输出共 20 余万石，其中大米约占 98%。

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沦陷后，生丝出口受阻，四川产销倍减，绵阳市境年均总产量降至 3000 余担。加之川陕公路通车，甘肃、青海、陕西一带山货、药材扩大幅射，致绵阳市境药材由畅转滞，附子、麦冬产量分别下降至 160 万市斤和 11 万市斤。但因淮、粤食盐输入受阻，川盐发展，绵阳市境食盐产销 42.7 万余担。抗日战争初期，茶叶贸易短暂兴隆，绵阳市境平武、北川、安县年产销 4 万担左右，较民国初年增长 1 倍。随着洋纱、洋布输入骤减，

土纺土织焕发生机，仅三台县手工纺织机由约 2000 架增至 8 万架，年产纱 500 万市斤，销本埠 200 万市斤，成都 140 万市斤，余销邻县及云、贵、陕等地，年产土布约 38 万疋。抗日战争中期，酒业崛起，绵阳市境各县无不产酒，销量由民国初年 200 万市斤上升到 537 万市斤，创历史最高水平。猪肉市场稳中有升，宰猪量较抗日战争前年宰 17.1 万头略有增加。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金融混乱，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捐税苛索猛增。民国 36 年（1947 年），市境绵阳、彰明等县各种摊派达 379 种，其中，中央政府 35 种，省府 42 种，县乡 302 种，各种摊派中针对商业的 75 种，致使商业负担过重，举步维艰，全面衰落。到民国 38 年（1949 年），生丝产销江河日下，绵阳市境产茧 1226.5 吨，即全制丝不过 2000 担。食盐产销跌入低谷，年仅 29 万担。绵阳市境不产食糖，历仰输入，年约 300 吨，一般市民难有口福。商贩不堪重负，抽资歇业者众，绵阳市境仅有商贩 3.66 万户，6.42 万人，较民国初年锐减。居民购买力低下，人均仅 19.56 元（已折新人民币，下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仅 4242.7 万元（不含农民零售）。

民国初期，绵阳市境商业小有发展。抗日战争起至 1949 年，政局不稳，经济萧条，物价暴涨，货币贬值，市场动荡，市境商户锐减，交易下降，商业由兴转衰，至新中国建立后始有转机。

（三）

建国后，绵阳市境商业有了很大发展。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绵阳专区根据中央和西南军政委员会规定，统一币制，打击投机，开办储蓄，发行公债，加强国营公司购销，回笼货币，使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得以消除。物价平稳后，货物滞销，部份工商户停产歇业。在绵阳专署工商科多方面动员开业、复业的同时，绵阳专署财委采取组织工商联营、联购联销，对手工业实

行加工、订货，降低批发起点，扩大批零差率，由国营公司让出部份零售阵地、经营品种等措施，先后两次调整了工商业，使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保持适当比例，并多次举办物资交流会，活跃了市场，促进了私营商业的发展。到 1953 年底，绵阳专区有私营商户 3.08 万户，比 1950 年 1.8 万户增长 71%。

国民经济建设时期，国营商业逐渐形成规模。1953 年，改进了商业体制，按经济区域建立了批发站，废止了上拨下卖的商品调拨制度，全面实行了经济核算制。1953 年至 1954 年，国合商业进行了三次分工（第一次按商品分工，第二次按城乡分工，第三次城乡分工结合商品分工），解决了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商业两套批发机构平行，经营交差的矛盾。1954 年，绵阳专区国营花纱布、百货、石油、煤建、专卖、贸易、医药等专业公司已有职工 1754 人。国营商业对市场的领导地位初步建立，公私经营比重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合商业经营比重已占 75.59%。1954 年底，绵阳专区私营商业总户数比 1953 年下降 37%。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本着“一面前进，一面安排，前进一行，安排一行”的精神，绵阳专区对 27 个自然行业的 3503 户私营商贩进行了国家资本主义改造。1955 年，绵阳专区有国营专、县公司、批发站等机构 45 个，职工 2235 人，私营批发商已为社会主义商业所代替，国合商业批发比重共占批发总额的 93.03%。私营零售方面，凡国营商业已全部或大部掌握货源的行业，已基本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为国合商业经销、代销的商户已有 5396 户，私商中的小商贩，部份也通过合作化道路组织起来。1956 年上半年，对私改造进入高潮，为适应形势，绵阳专区新增国营机构 58 个，在地委私改办指导下，经过清产核资、经济改组、人事安排、商业网点调整、选派公方代表、改进劳动组合、归口分工改造等一系列工作，到 1956 年下半年绵阳专署商业局成

立后，绵阳专区已改造私营商业、饮食服务业 19581 户，29209 人。其中，转为公私合营的 4769 户，8373 人；转为合作店、组的 14718 户，20619 人（含城市小商贩 7321 户，9439 人）；直接转为社会主义国、合经济的 94 户，217 人。尚未改造的 5491 户，6247 人。通过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壮大了国营经济，建立了集体经济，为以后集体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使绵阳专区商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国营商业为领导，合作商业为助手，个体商业为补充的流通体系初步确立，但流通渠道单一，基本上由国营商业独家经营的局面也开始形成。1957 年，绵阳市境国营商业商品纯购进 5573 万元，纯销售 6336 万元，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13953 万元的 45.41%。

（四）

1958 年 5 月，根据国务院批转商业部的报告，改进了商业体制，绵阳专区将供销合作办事处、服务局并入商业局，撤销了部份公司，实行政企合一。由于受“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在“全党全民办工业”和商业部门“通商通农又通工”、“为工业打补丁、填空白”的口号下，绵阳专区商业系统挤出大量人力、资金，掀起了“大办工业”高潮，先后自办各类厂（坊）2885 个，协助公社办厂（坊）6.8 万多个。同时，为了跟上“大跃进”的形势，商业部门提出了“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和“出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的大购大销经营方针。各县商业部门组织了“财贸野战兵团”、“万人探宝团”、“千人采宝队”采集野生原料，开展预约收购。“大跃进”时期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左”倾错误，使商业工作遭受严重损失。绵阳专区商业系统在“三清”（清理资金、库存、帐目）中，对“大办工业”和“大购大销”中的损失浪费进行了清理，共清出削价、报废、丢失短少、呆帐、贪污盗窃等损失 4587.28 万元。同时，“生产什么，

收购什么”，消费者就买什么，其实质是重生产、轻流通，使商业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成为生产的附庸，不能对生产发挥有效的影响和引导。

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左”倾错误，使国民经济连续3年发生了严重困难，市场供求失衡，商品匮乏，物价上涨。绵阳专区广大商业职工在口粮“低标准、瓜菜代”的困难条件下，发扬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努力工作。为保证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绵阳专区商业部门先后采取了凭证供应、高价供应、特需供应等方式。凭证供应的商品主要有粮食、棉布、食油、食盐、食糖、糖果糕点、猪肉、蔬菜、火柴、煤油、钢精锅、奶粉、针织品、絮棉等16种。高价供应的商品有糖果、糕点、酒类、砂糖、自行车、手表、针织品、餐食等8种，其价格本着“敞得开，卖得出”的原则确定。另外，对部份人员采取了特需供应，以保证他们必需的部分生产和生活物货。享受特需供应的人员主要是工矿企业从事“三高两下”（高温、高空、高寒、井下、水下）和有毒有害作业的职工，县级单位副县级以上干部和专级单位17级以上干部，老红军和13级以上老干部，民主人士、高级知识份子、工程师、名医师、革命残废军人、厂矿病员食堂和医院病员，以及新婚、产妇、婴幼儿等。特需供应的商品，除工矿职工的工作服、肥皂、手套等劳保用品外，主要是副食品中的猪肉、鲜蛋、食油、大豆、白酒、香烟、干杂品等，但供应量既小且不稳定，根据货源情况曾多次调整。

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商业工作经受了严峻考验，商业部门实行了保证人民生活最低需要的种种应急措施，对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稳定市场，起了重要作用。

自1961年起，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鉴于1958年体制调整后出现的许多问题，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绵阳专区1962年将供销和外贸系统从商业局系统分

出，并调整批发机构，恢复和建立专业公司，实行政企分开。同时，将 1958 年后升级过渡为国营的合作商店调整出去一部份，恢复成立合作店、组。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国家“三线”建设上马，绵阳专区成为四川省重点建设地区之一。为保证工矿职工的生活物资供应，专区内有工矿区的县成立了工矿贸易公司，并在工矿区开设了各类商店。

通过调整，国民经济和市场情况好转，高价商品逐步退出高价，凭证供应商品减少，人民购买力增强，到 1965 年，绵阳市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 1957 年增长 63.11%。同年，绵阳市境商业部门商品纯购进 4019 万元，纯销售 7001 万元，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占 30.76%。

（五）

1966 年 3 月，专区商业局、供销合作办事处、工商局、外贸办事处再次合并为绵阳专区商业局。同年 5 月，开始了长达 10 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踢开党委闹革命”，到处揪斗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破“四旧”和对所谓“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管、卡、压”进行大批判的混乱局面下，商业工作受到了严重破坏：一是商业领导机关陷于瘫痪，行政管理系统和商业经营系统及其与各地、各部门的联系基本中断，绵阳地区商业行政机构被撤销，人员全部下放“五·七”干校劳动，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期才完全恢复；二是停售所谓“有问题”商品，有的撕毁商标降价销售，有的加工改制，还有部份长期积压，霉烂变质，损失浪费严重；三是“把三尺柜台作为阶级斗争的前哨阵地”，传统的服务项目被取消，理发业取消烫发，浴池取消擦背修脚，饮食服务业由顾客自找座位，自取饭菜，自打开水，自理床铺，服务质量普遍下降；四是沿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对待集体商业，甚至把集体

商业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来割，阻碍了集体商业的发展；五是鼓吹“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形成企业不计成本，亏损有理，纪律松弛，组织涣散，职责不清，无章可循，管理混乱，亏损企业逐年递增。到1972年，绵阳地区商业系统亏损企业达61个，亏损金额601万元。1973年1季度末，亏损单位增加到120个。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社会秩序混乱，集市贸易关闭，商品运力不足，交通受阻，货源紧缺，副食品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为安排市场供应，保证群众基本生活需要，商业部门对部份商品继续沿用了经济困难时期的凭证供应方式，同时，千方百计组织货源，使商品供应紧张的状况有所缓解。70年代中期，为保证“三线”建设工矿区的生产、生活必需品供应，梓潼、广元、平武先后成立了第三、四、五工矿贸易公司，实行厂办厂管，由商业部门进行业务指导，并按县公司待遇分配、调拨商品。

在10年动乱中，商业机构、体制、流通渠道、企业管理等方面都受到严重破坏，商业工作处于一片混乱。但广大商业干部、职工在动乱中仍坚守岗位，坚持营业，不辞劳苦，踏实工作，为稳定市场物价，保证人民基本生活需要做出了重大贡献。

1976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后，到1978年，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货源渐丰，市场供应好转，一般工业品退出凭证供应，实行敞开销售。1978年，绵阳市境商业系统购进总值达1亿元，其中，纯购进9358万元；销售总值2.68亿元，其中，纯销售1.69亿元，纯销售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5.98亿元中占34.16%；全部国营企业实现利润1225万元。同1976年比，纯购、纯销和全部企业利润分别上升32.53%、27.27%和100.82%。

（六）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